

现代性视域中

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

研究

Marxist Learning Party Research in the Horizon of Modernity :
Historical Dimensions and Perspectives

以历史的维度与视角

赵成斐◎著

学习型政党应以更理性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来寻求发展。其出发点是从我以质量求发展转向以创新求发展。其基础是从以物质资源为主转为以智力资源为主，其结构是从纵向的线状型转向横向的网络型，其理念是从坚持以制度来控制转为坚持以学习来激励。



科学出版社

现代性视域中

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

研究

Marxist Learning Party Research in the Horizon of Modernity :
Historical Dimensions and Perspectives

以历史的维度与视角

马克思主义

D26
66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性视域中马克思主义
学习型政党研究』(10CGML13YBB)成果

本书受『杭州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平台建设项目』资助

科学出版社



北航

C1633180

D26
6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视域中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研究：以历史的维度与视角 / 赵宸斐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3

ISBN 978-7-03-037057-0

I. ①现… II. ①赵…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研究 IV. ①D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7147 号

责任编辑：付 艳 朱丽娜 张春贺 / 责任校对：张小霞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楠竹文化

编辑部电话：010-64033934

E-mail: fuyan@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3 年 4 月第 一 版 开本：B5 (720×1000)

2013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5

字数：257 000

定价：5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现代性的变迁：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产生的时代背景 10

第一节 现代性内涵 10

一、从现代到现代性 11

二、现代性的内涵 14

第二节 现代性的变迁 17

一、科技现代性的变迁：新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17

二、经济现代性的变迁：知识经济的凸显 20

三、社会现代性的变迁：学习型社会的兴起 22

第三节 现代性的变迁与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出场 27

一、现代性的变迁催生学习型政党 28

二、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内涵界定 31

三、学习型政党：适应现代性变迁的战略选择 34

第二章 现代性的模仿：中国政党对现代性的模仿与移植 41

第一节 中国境域中现代性的启蒙与焦虑 41

一、现代性的启蒙与焦虑 42

二、民权政治的演练与现代性政党的生成 47

三、民国初年政党展现的现代性特质 51

第二节 对苏联政党体制的模仿与移植 55

一、对苏联政党体制的移植与党国体制型政党的建构 55

二、由“社会党”到“共产党” 60

三、东方国度里的“苏维埃模式”的建构 64

第三节 “中国化”命题的现代性意识及探索 73

一、“中心主义”与“边缘意识” 74

二、“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79

三、“中国化”命题的现代性探索 80

第三章 现代性的探索：中国政党对现代性的试错与创新 91

第一节 延安模式与政党的现代性提升 91

一、学习的现代性与本土化政党的经验累积 92

二、新民主主义政治模式的建构 96

第二节 政党革命的现代性冲动与输出 105

一、现代性“革命”的流变及其话语特质 105

二、中国式“革命”的现代性输出 110

三、革命现代性后果——留给当下世界的反思 119

第三节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模式的建构 123

一、自觉的现代性与本土化探索 123

二、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本土化建构 127

三、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现代性特质 134

第四章 现代性的借鉴：中国政党对国外政党模式的借鉴与反思 139

第一节 苏联政党的威权模式建构 139

一、由民主立宪到一党执政 140

二、威权政党组织结构的演变 146

三、钦定教科书与实行宏大叙事 149

四、“大清洗运动”与维护社会的“纯洁性” 154

第二节 “欧洲共产主义”与政党发展模式探索 158

一、葛兰西思想的启迪与“欧洲共产主义”新概念的提出 158

二、“欧洲共产主义”的探索与欧洲共产党的政策调整 162

第三节 “粉红色欧洲”现象与政党现代性纠错 172

一、“粉红色欧洲”现象的出现 172

二、社会民主党的现代性纠错方案 173

第四节 由“深绿”到“浅绿”的适度回归与调整 182

一、生态运动的演进与绿色政党出现 182

二、由“深绿”转向“浅绿”的现代性意蕴 186

三、如何吸纳绿色政治 192

第五章 现代性的反思：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治理能力的再造与提升 195**第一节 风险社会的来临——一种人类无法回避的境遇 195**

一、风险社会的来临 196

二、风险社会展现的特征与结构 199

第二节 风险社会视域中政党面临的困境与限度 206

一、政党的结构与功能遭遇挤压 207

二、政党政治控制力的下降 207

三、政党号召力的弱化 208

四、对政党的意识形态造成信仰危机 209

五、对政党的公信力造成信任危机 210

六、政党化解舆情带来引导危机 210

七、对政党的合法性造成认同危机 211

第三节 风险社会中政党治理能力的再造与提升 212

一、健全网络话语表达机制 212

二、丰富政党的话语叙事表达 213

三、提升政党形象表达与传播力 215

四、打造与提升公共话语场 217

参考文献 219**后记 234**

导 言

当今，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不但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深刻地影响着国际经济、政治与文化关系。可以说，当今社会现代性的发展日益表现出知识化与信息化的特征。与传统经济相比，知识经济从根本上来说主要表现为“智慧型”与“创新型”特征，这种经济发展已超越了传统经济的物化模式，主要依赖于人的智慧，通过创新实现的，而创新的根本途径就是学习与教育；同样，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是今天现代性社会的主要特征，互联网的发展改变着当今世界各国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也为人们随时随地学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和便利条件。互联网作为一个巨大的信息平台，为超越国界、地域、族群、时间与文化的知识积累、整合与更新提供最为便利的工具，世界各地人民摆脱了时空的约束，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地相连。当前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后现代性特质，社会发展步伐急剧加快，各个方面的更新节奏越来越快，亟须人们在各个方面的不断创新与施展才华。人们只有自觉地参与终身学习，才能跟上时代的节拍，才能发挥创造性才能，由此也引发了世界政党及各种政治组织进行深入思考如何加强学习、创新以适应时代要求。当今社会应当是以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为基础，实现教育的社会化、社会的教育化，是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社会，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社会发展根本目标的社会，是以提高人的素质为社会发展根本途径的社会。这种现代性社会应当彻底摆脱“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的桎梏，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发展模式，充分展现出人力资源开发和发挥人的创造力对社会发展的价值。早在1965年，法国人保罗·朗格朗（Paul Lengrand，1910～）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ited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简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巴黎召开的“第三届国际成人教育促进会”上就正式提出过“终身教育”的概念。从此，“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学习社会”的概念便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开来。紧接着，196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1899～1977），在其专著《学

习化社会》中，首先提出“学习型社会”的理念。他认为学习的根本目的应该是使每一个人的自我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并促进其人格臻于完美。赫钦斯始终坚持认为要把人性的培养放在教育的首要位置。他说：“教育必须从单纯的职业获得及人才的养成中解脱出来，而向人生真正价值的实现这一目标转换。”^①他还指出：“还应以学习成长及人格的构建为目的，并以此目的制定制度，以及更以此制度来促使目的实现，而由此建立一个朝向价值的转换及成功的社会。”^②在此，赫钦斯强调了学习社会对人、人生及人生真正价值的培养和实现的重要性。只有充分体现人的价值，为人的价值的培养和实现提供充分的环境与保障，学习社会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也只有使人生的价值得以充分体现，才能使人类愿意学习和接受教育的天赋得以充分地发展与展现，学习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才能成为现实。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国际教育委员会的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该报告深刻地分析了新的科技革命对人类活动的影响，认为人类正在走向学习化社会，每个人必须不断地学习，才能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终身教育是学习化社会的基石。一些国家和地区纷纷把学习列入发展战略，有的国家和地区通过立法加以保证。如法国1972年通过了《终身教育法》，美国1976年通过了《终身学习法》，日本于1990年通过了《终身学习振兴法》，欧盟于1996年发表了《迈向学习型社会白皮书》。可见，为适应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要求，构建终身学习、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已成为引领世界的先进潮流。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推动了人类的物质进步，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环境，而且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如《学会生存》一书所指出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技术革命所产生的后果相比拟”^③。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最大后果就是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称之为“后工业文明”社会的到来。科学技术的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得人类开始接受第二次现代化的洗礼，第一次现代化是以工业化、城市化、法制化、福利化为标志和目的，而第二次现代化则以信息化、知识化、人性化标志和目的。第二次现代化为人类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机遇，也给人类的发展提出了

① Hutchins R M. 1968. The Learning Society. New York: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② 埃德加·富尔. 1979. 学会生存. 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5.

新的挑战。为了适应第二次现代化带来的挑战,人们需要进行系统性、适应性和创造性的学习,这种学习开始打破短期反应的局限,至少它启示人们如何在经过一段较长时间之后顺应变动中的趋势。这种学习是一种创造性学习,只有这种学习才能触及行为背后的原因,并进而改变行为变化形态。这就是说,结构影响行为,行为又能改变背后的结构,并能够产生不同的行为变化形态,使这种学习具有创造性。

20世纪60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弗罗斯特(Jay W. Forrester)教授提出,通过改变传统的管理模式来促进学习创造性的发挥。他设想了一种未来理想的管理组织:①层次扁平化,管理系统内部应当从那种上下从属关系转向工作伙伴关系;②组织咨询化,组织内部应当充分地相互咨询,对外要不断学习;③系统开放化,管理结构应当在适应环境和任务的要求下不断地调整 and 改变。他把这种新型的管理组织命名为“学习型组织”,并致力于学习型组织的研究和推广。在弗罗斯特教授的影响下,他的学生彼得·圣吉博士(Peter M. Senge, 1947~)致力于将系统动力学与组织学习、创造原理、认知科学、群体深度对话与模拟演练游戏融合,逐渐发展成一种学习型组织模式。圣吉博士在《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务实》中系统提出学习型组织必须经过五项修炼,即自我超越、心智模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及系统思考,以应对现代性社会发展的要求。人们需要不断突破自己的能力上限,创造真心向往的结果,培养全新、前瞻而开阔的思考方式,共同学习与不断学习,全力实现抱负。彼得·圣吉博士对人类历史上关于“如何学习”的探讨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有效的论证,并整合了一些其他内容,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科学的理论。彼得·圣吉提出的系统论式的学习理念,激发了新时期各种组织和团体对变革的需要,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知识是一种存在于组织内部而并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宝贵资源。学习型社会是以学习型组织为基础的,学习型组织的学习不仅强调个人的学习,更重要的是强调组织的整体学习,即有组织、有系统地学习,其目的就是克服组织发展瓶颈,改善组织成员的关系,消除影响组织整体学习智商的不利因素,提高组织的群体智商,使团体智力高于个人智力,并通过合理的整体搭配,使整个组织形成有亲和力和战斗力的团队,使组织能以具备创新性而又协调一致的行为适应环境而得到发展。

学习型组织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思维为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现代性学习加强自身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以学习型组织的模式推进党的建设,通过“五项修炼”,不断突破心智模式,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以创新的思维

和行为对待一切，注重党的各级组织的整体学习，从而使党在学习上保持持久的优势和持续创新能力去不断开创未来，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更有作为。在治理理念深刻变迁的社会背景下，传统政党通过理念转型，实现以政党现代化为目标的“政党再造”已成为顺应时代变化、维系政党自身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如何实现现代化政党的再造？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消除传统政党组织结构官僚化特征。传统政党组织是一种带有或强或弱集权倾向的金字塔形组织体系，以庞大、垂直式的组织工具维持着对社会民众，尤其是对广大普通党员的控制，以层层节制的中、下层领导角色承上启下，来达到上下沟通与交流的目的。从系统论角度分析，传统政党的这种组织架构无疑存在以下缺陷：①环境比较封闭，等级观念比较严重，规则制度过于繁杂；②组织权力结构集中，决策权集中于高层；③纵向的沟通和协调更多地表现为单一性、控制性与服从性。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冲击，现代社会结构日益分化，传统的治党理念与治党模式越发地滞碍了党员自主性的发挥，制约了党内民主的发展，政党组织结构本身的固有缺陷越来越突出，急需实现政党再造与更新。通过党组织民主生活制度建设，把党组织建成一个人人畅所欲言的开放的组织环境，改变传统意义上诸如不善于表达、不敢于表达等阻碍团队学习的心智模式。但是，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绝不是抛开党组织的基本结构，去建立另一个新的组织结构，而是把政党组织与学习型管理理论进行创造性的结合，尤其是把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管理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各级党组织的管理和建设上，把我们的政党组织发展成为适应时代发展的先进性组织。在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队伍建设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广大党员在“系统思考”、“团队学习”、“不断创新”、“自我超越”等方面的能力培养，形成“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的氛围，通过培育和提高学习力，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学习型政党以更理性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来寻求发展，学习型政党的出发点从以质量求发展逐渐转向以创新求发展，其基础从以物质资源为主转为以智力资源为主，其结构从纵向线型转向横向网络型，其思想从用制度来控制转为用学习来激励。学习型政党不再以使人更勤奋工作为荣，而以使人更聪明地工作为目的；其学习方式，以团组学习代替个人学习，以增强学习力、提高群体智商替代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与方法。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还要高度重视信息化的发展，努力打造信息化政党。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社会，存活在信息社会里的政党，本身也必须实

现信息化,以适应信息化发展的要求,才不至于被信息社会淘汰。如果说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没有成为信息化政党,主要是因为客观条件不允许的话,那么在当今已经具备客观条件的情况下,还达不到信息化政党的要求,则完全是自身主观努力不够导致的。中国共产党要积极、主动地结合信息社会的特点,重视网络对社会的重大影响,深入研究将网络技术应用到政党活动各个方面的技术和措施,充分利用先进网络信息技术,把自身建设为一个在网络信息世界里轻车熟路、游刃有余的政党。只有不断学习、创建学习型政党、提高党的执政理性,才能应对时代提出的新挑战。

本书主要根据现代性社会的变迁以及“现代性”含义不断丰富与完善的发展趋势,尝试从历史的维度与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学习政党进行系统分析与总结,把对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研究放在历史发展的维度中,从历史的语境中去还原和把握其现代性特质。正是通过诸多对历史的体验、触摸与记忆,“思想”、“观念”、“知识”被建构和再度建构,来厘清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对现代性的认知、模仿、学习、超越与创新建构、发展和壮大自己的队伍,并厘清其内在的秩序与逻辑关系。从历史的维度进行学术研究的意义,正如葛兆光教授在《思想史:既做加法又做减法》一文中谈到,对待历史中文献,要做到不仅尽可能的还原、发现历史的真相,更重要的是把“那些逐渐被有意无意淡忘的、边缘化的、被驱逐到历史记忆深处和社会生活秘密处的东西”^①作为碎片、器物一样打捞出来,进行拼合、还原。这也是笔者写此书的主要目的。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追求现代性精神的内涵,我们不仅要从事空方面厘清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化以及追求现代性的艰难、曲折的经历,而且还要具备政治学的视野和社会学的关照,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通过学习谋划现代性的历史维度。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建构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与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谋划“现代性”联系起来,把中国共产党如何建党、建国和执政的时间跨度与时代性、民族性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分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危机日趋加重,中国对现代性的追求主要体现在改造国民性、民族救亡、国家建构、革命与斗争等方面,举国上下急需新的组织力量来领导民众进行救亡图存。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积极把首创于欧美诸国的西方现代政党观念输入中国并传播开来,强调在借鉴

① 葛兆光. 2003. 思想史: 既做加法也做减法. 读书, (1): 4~11.

西方现代性政党理论时,应保持一种转换意识和方法论反思,把西方政党思想有限而适度地嫁接到中国问题情境中来,进而揭示中国现代性转变中的那些本土问题,试图依靠政党政治实现民族复兴与国家建构。一时间,在东方国度中,革命政党、立宪政党相继创设,中国近代政党创建的基本格局初步呈现出来。政党政治成为当时社会普遍的要求。

由于俄国的十月革命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反响。中国共产党将社会主义理想锁定在俄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上面,在对苏维埃运动进行移植与模仿的过程中,也尝试着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独立自主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最初对现代性的接触来自对列宁式经典现代性政党的模仿与学习。中国共产党本着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内在要求,开始在现代性的试错中比较、反思与创新,共产党大胆地置换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发生、发展的语境,同时又通过保持党的先进性,不断进行理论和思想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开创和实施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成“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中国共产党通过“延安模式”探索,尝试对现代性学习与本土化的经验进行累积与转化,最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本土化建构。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迅速将西方国家在近二百年间实行过的政党制度都试验了一遍,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确立为止,才使中国逐渐摆脱了“模仿”与“移植”的被动局面,进而自觉地构建具有新现代性特质的政党制度。这种探索过程本身既反映了现实进程自开始起就带有明显的政治选择性,也体现了探索适合现实需要的政党制度的曲折性。政党的现代性选择集中表现在欧美模式与苏俄模式,这两种政治制度哪种更适合中国政党制度的嵌入,并使中国政党迅速、有效地领导和控制中国的政治局面,经过反复地实践与探索,很遗憾这两种模式都未能对当时中国权力架构作出合理的政党政治安排,随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人士在批判国民党一党专政、吸收民国初年政党政治教训的基础上,终于确立了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参政的新型政党政治格局。这种新型政党政治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执政党内部的集中统一为中央集权提供了绝对权威,而参政党的参政地位则在维护中央集权稳定性的基础上,又把社会各阶层的参政因素注入执政权力之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过度集权的僵硬性与保守性,保证了中央集权某种程度的灵活性与创造性。这

种有着相当程度韧性和活力的权力格局及政党政治安排，既保证了制度运行的效力，又巩固了合法性基础；与此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抱着开放的心态不故步自封，对国外政党发展模式进行借鉴与反思，吸取经验教训。苏联威权模式政党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主要借鉴与反思的政党。苏联政党作为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其建构的过程中，既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思想进行科学有效地汲取与消化，也没有正确处理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更没有形成具有典范意义的社会主义民主政党，反而成为一党专制的典型，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为中国政党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教训。

随着时代的变化与社会的转型，西方一些主要政党纷纷做出适应性变迁，在理想目标、价值理念、党章党纲、方针政策等方面进行了结构性调整。无论是欧洲共产党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引起的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的新变化，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面临的新形势与新发展而提出的“欧洲共产主义”政策，还是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根据“第三条道路”理论提出的现代性纠错方案，都是对现代性进行学习、反思与调整的结果。尤其是随着现代性的扩张、全球化的推进以及信息网络社会的发展，人类正在进入贝克所预设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从根源上讲，伴随着人类的决策与行为，是各种社会制度，尤其是工业制度、法律制度、技术和应用科学等正常运行的结果。我们要把政党政治置于风险社会中去考量，实现风险社会中政党治理能力的再造与提升，这也是政党应对与化解风险的一个重要路径与维度。在风险境域中，人们因政治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和差异而产生诸多冲突，往往借助于现代政党进行调配和整合。如何在规避和化解风险中，既能秉持合法性与世俗化的价值原则，适时调整、修缮和整合传统的话语叙事，又能创建新的适合当代社会实际的政党政治，是当今政党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尤其是随着网络信息社会的深入发展，网络社会的发展正在把人类带入“电子民主”的新政治空间时代，人类的民主化进程得以前所未有地快速发展。在以“电子民主”为主导的新政治空间时代，人们的公共生活、公共领域充满着新媒体的元素。新的大众传媒很可能成为“形象政治”的最佳传递者和塑造者，人类将逐渐步入一个“形象主导”的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量在新的政治环境中利用媒体来塑造与展现形象，以实现政党治理能力提升，这是一个很紧迫的现实课题。

任何一个现代性的政党只有从全球化社会变迁的新语境出发，才能真

切地把握现代性的范式变革与发展命运。各种社会形态与文明模式既相互碰撞又彼此交融,使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历时的方式共存,并相互促进。无论是总体性、卡特尔式和党国体制型地表现出高度组织化、体系化、权力集中化的具有“完美的政治和一式的政治”的经典现代性政党,还是强调非逻辑性、非理性、不确定性和差异性的,回避了作为政治的核心概念,如权力、冲突、分层、对抗及统治权等的后现代性政党,在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中,都要具有宽容性、多样性、差异性、主体间性与可对话性等性质,并淬炼出贴近现实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品格,才能面对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自觉地积极调整执政理念和策略,以谋求更好的发展。

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来说,新现代性的建构既不同于经典现代性政党,也不同于后现代性政党,而是以超越现代性地平线的后现代向度来引领和改造的现代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新现代性”命题应当包括以下三个要点:①受初级阶段的国情所限,中国现阶段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基本走向仍然是现代性而不是后现代,这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变革世界”的基本层面,也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现代性视域的着力点。中国在总体上仍然处在工业化的中期,农村人口依然是人口的主体部分。②中国政党追求的现代性是属于新全球化时代的一部分,既不同于在旧全球化时代韦伯所倡导的经典现代性,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现代或者第二次现代性,而是一种全新的现代性。③这一现代性必定是与新全球化时代以及后现代发生“挑战与应战”关系的现代性,因而是在后现代引导下重建现代性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新现代性。中国政党的新现代性应当具有包容差异和多元的气度、化解分歧和冲突的能力、勇于承担风险的精神、有为广大民众谋求共同利益和意义的责任,以及对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坚强的集体信念。中国政党的新现代性必将促成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嵌入与协调。中国政党的新现代性是一种真正“以人为本”的社会实践,是在社会与自然、社会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基础上的重建,促成现代性回归到推进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这一根本目标上来,是真诚地实行“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人的需要和全面发展为目的,是“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①当代中国政党正在努力遏制旧式现代性的负面结果,加速推进新型现代性的实践进程,这就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1961.德意志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67.

理论生产和创新添加了现实动力，也必将使得马克思主义政党学的现代性发展呈现出新的广阔前景，使中国政党在国际上进行政党对话与交流中显示出独特的气度与作风。

在现代性发展进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要以自己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实施领导，以保证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必须不断改革，以适应领导现代化进程的要求。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和根本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发现，深化改革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大到民主政治、依法治国等，小到政企分开、党政关系、用人机制、监督制度等，最终都会归结到政党的领导和自身的建设上，这表明党的建设日渐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重大问题。进入 21 世纪，中国和世界都将继续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动，而就我们党来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也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动，今后我们党还将继续进行更高水平的深刻变动以适应现代性的要求。现代性本身不是孤立和故步自封的，是时刻处于变化、发展和提升的过程之中的，政党的现代性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性的代表，它的现代性和社会层面的各个现代性相比较，理当具有先导性、超前性、自觉性和示范性，正因为如此，我们迫切需要明确和科学地回答如何看待这些变动的问题，以促进党在新世纪全面加强自身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新觉悟。中国共产党要加强自身建设的示范效应，关键在于推进和完善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发展的助推器，没有完善和发达的党内民主，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协商。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二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当下，我国社会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利益分化逐渐明显、利益冲突日益剧烈，化解分歧、消除差异、构建和谐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关键。加紧推进党内民主和民主协商的发展，实现两者之间的充分互补和协调，是积极面对并接受多元社会的现实、有效地消除分歧和差异、达成共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中国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新现代性的建构，在物质形态层面，要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及信息化的发展；在制度层面，要积极推进民主化、法制化、科层化建设；在文化价值层面，要彰显自由、民主、平等和公正；在人的行为模式层面，要高扬人的理性、科学、自主、尊严等，进而加速推进新型现代性的实践进程，体现“以人为本”，以人的需要和全面发展为目的价值关怀。

第一章 现代性的变迁： 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产生的时代背景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欧美国家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之后的一系列的修整与重建，其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高新技术快速发展、知识经济凸显、信息社会的到来与学习型社会的兴起，引发了现代性的重大变迁。欧洲一些重要国家相继进入了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所谓的“后工业社会”^①。面对现代性的发展与变迁，马克思主义政党也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 and 机遇，如何在变化了的世界语境与社会结构下寻找新的出场路径、创建学习型政党、提升执政能力，已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面临的一个必然抉择。

第一节 现代性内涵

现代性，是在人类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伴随着启蒙时代、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产生的一种自觉自为的精神与价值诉求。现代性不仅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表达与陈述，而且也是对历史事件的一种反思与检视。现代性作为人类的一种命题，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领域得以展开，尤其是在政治领域中的演进，促使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逐步完善，推动人类建立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创建出一整

^① “后工业社会”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1973 年）在其名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贝尔在书中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后工业阶段。其特征为：a. 由产品生产转变为服务生产；b. 职业：专业/技术人员主导；c. 理论知识居中心地位；d. 未来：技术评估及智能技术的重要性；e. 管理革命：管理由人与自然转变为人与人；f. 新的匮乏——信息、时间、资源的供应不够；g. 信息经济的挑战：信息=公共物品。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对西方社会结构变化给予了一种社会预测。正如他本人强调的：“这首先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其结果在具有不同政治和文化构造的社会中将有所不同。然而，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它将是 21 世纪美国、日本和西欧社会结构的一个主要特征。”

套以自由、民主、平等与正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现代性，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从现代到现代性

“现代”一词出现的较早，大约在公元五世纪就有人开始使用。德国学者汉斯·罗伯特·尧斯（Hans Robert Jauss, 1921~），曾对“现代”一词的起源与发展做过深入研究，他认为，这个词源于拉丁语单词“modernus”，其本意表述为“目前”（the present）、“现在”（right now）或“当今”（today）。现在的含义主要是指区别于过去的自己生活的当下时代。“modernus”之词出现不久，像“modernitas”（现时代）、“moderni”（现代人）等拉丁语汇也很快在欧洲社会流行和铺展开来。但是，如果仅仅从“现代”的语义角度分析，“现代”总是与“往古”相对，两者构成了一种生存性的联结、张力和矛盾。但是如果从历史进程或年代学的意义来对“现代”进行定位和认知，“现代”只能在断代史的意义上使用，仅仅表示为编年史意义上的“现代”理念，并没有揭示出现代性特有的精神文化内涵和现时代人们的态度。^①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间区域都曾经属于“现代”，而任何一个曾经被称为“现代”的时间区域都将成为“往古”或“过去”。

关于“现代”的界定与来源分析，德国学者于尔根·哈贝马斯主张现代源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也有学者认为，17世纪的社会革命和自然科学的兴起是现代的标志。国内学者俞吾金提出了一个较为确定的现代时间概念。他认为：“就我们这里讨论的严格的含义来说，‘现代’大致上指的是从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到20世纪40年代二战结束这个历史时期”^②；而罗荣渠先生则以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为标志，把“现代”定位为自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一直到现在这样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心内容是在现代生产力引导下人类社会从农业世界向现代工业世界的大过渡。^③显然，要解析“现代”现象的结构与机理，单从时间的维度是无法全面厘清其丰

^① 汪行福，2000. 走出时代的困境：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反思.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9~30.

^② 俞吾金，2002. 现代性现象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8.

^③ 罗荣渠，2004.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北京：商务印书馆：418.